

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

——中国、印度、日本及德国市场经济的改革进程及其成就

**Economic Order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Market
Oriented Reform Processes & their Results in China,
India, Japan and Germany**

容敏德 李罗力 主编

Editor-in-chief

Winfried Jung Li Luoli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中国、印度、日本及德国市场经济的改革进程及其成就/容敏德 李罗力主编.—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 7

ISBN 7-5017-7621-0

I. 经… II. 李… III. 市场经济—经济发展—研究—中、印、日、德 IV. F1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64210 号

出版发行：中国经济出版社 (100037·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北街 3 号)

网 址：www.economyph.com

责任编辑：黄艳 (电话：13671363102)

E-mail：Yanhuang1605@yahoo.com.cn

责任印制：石星岳

封面设计：曾世艳 冯月秋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承 印：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7 字 数：376 千字

版 次：2006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5017-7621-0/F·6334 定 价：35.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68359418 68319282

目 录

序 言	容敏德 (1)
第一章 国际性区域竞争的经济结果	
国际竞争力的经济成就	弗朗兹·肖泽尔 (2)
评论	(8)
讨论	(9)
第二章 市场经济的整合需要有效的政策	
通过创造竞争制度保障经济自由	阿明·博奈特 (16)
评论	(22)
第三章 社会保障是发展中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发达市场经济体中的社会保障体系：德国的经验	斯蒂芬尼·瓦尔 (26)
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东条吉朗 (30)
评论	(34)
第四章 劳动市场政策均衡改革的基本特征	
印度的劳动力现状与劳动法的完善	文尼特·弗曼尼 (38)
评论	(53)
第五章 贸易自由化和资本市场自由化：趋势和挑战	
印度的市场改革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阿尔文德·弗曼尼 (58)
评论	(62)



第六章 全球化中成熟市场经济的结构性困难

经济全球化时期成熟的市场经济存在的结构问题：日本案例分析 … 菊池努 (66)
评论 …………… (72)

第七章 处在全球化和发展中的亚洲

东亚经济合作的进程以及东亚经济共同体 …………… 陆建人 (76)
亚洲正加强区域性合作——东盟+3 和东亚共同体的进程 …………… 神保谦 (82)
关于东亚经济合作问题的几点看法 …………… 姜跃春 (90)
评论 …………… (92)
转型时期的中国：完善制度与和谐发展 …………… 石小敏 (95)
评论 …………… (98)
中国、印度和日本：多哈发展谈判议程闭幕前的定位 …………… 松田直子 (101)
城市贫困与反贫困：发展隐患与历史责任 …………… 丁四保 (104)

后 记 …………… (107)

Contents

Preface	Winfried Jung (109)
<u>Chapter I Shaping Globalization</u>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Franz Schoser (112)
Comment and Discussion	(123)
<u>Chapter II Requirements of a Successful Policy of Market Oriented Reforms</u>	
How to Secure Economic Freedom by Creating a functioning Adequate Competition Order	Armin Bohnet (126)
Comment	(137)
<u>Chapter III Social Security as an Integral Part of Developed Market Economies</u>	
Market Economies; the German Perspective	Stefanie Wahl (142)
How to Establish Developed Social Security Systems Under the Globalization	Yoshiaki Tojo (149)
Comment	(155)
<u>Chapter IV Basics of a Balanced Reform of Labor–Market Policy</u>	
Balanced Reforms–Labour Market Policy; Indian Scenario–The Case for Labor Reform With a Human Face	Vineet Virmani (160)
Comment	(185)
<u>Chapter V Liberalization of Trade & Capital Markets; Tendencies & Challenges</u>	
Market Reform of India and Its Implication for China	Arvind Virmani (190)
Comment	(196)
<u>Chapter VI Structural Problems of a Mature Market Economy in Times of Globalization</u>	
Structural Problems of a Mature Market Economy–Study on Japan	Tsutomu Kikuchi (200)
Comment	(211)

Chapter VII Asia Facing Glob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East Asian Cooperation Process and EAEC Lu Jianren (216)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Asia – Process of ASEAN+3 and
the East Asian Community Ken Jimbo (226)
Comment (237)
Issues on East Asian Economic Cooperation Jiang Yuechun (241)
China in Transition; System Improvement &
Harmonious Development Shi Xiaomin (246)
Comment (251)
China, India and Japan: Position-Setting Before the Settlement
of the Doha Development Round Naoko Matsuda (255)
Urban Poverty and the Fight against Poverty; Potential Problems in
Development and Historical Responsibility Ding Sibao (260)

Postscript (264)

序 言

本书是由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和德国阿登纳基金会于2005年10月31日至11月1日在深圳联合举办的题为“中国、印度、日本及德国市场经济的改革进程及其成就”的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成果集。

德国阿登纳基金会是以基督教民主思想为基石的政治性基金会。在德国，我们致力于政治教育、政策协商以及发现和培养才华横溢的青年人；在国际事务中，我们强调政治对话以及信息和经验的世界性交流，从而促进国家之间的谅解。

在中国，德国阿登纳基金会的根本目的是支持中国的对外开放以及更好地融入国际社会，特别是经济转型和法治改革。所以，我们近年发起了多次主要关于市场经济方面的论坛和圆桌会议，并出版了许多图书。

最近，基金会围绕中国的两个重要邻邦——印度和日本，就这一主题发起了系列论坛。此次研讨会也是这系列论坛的一部分。

中、印、日、德四国专家汇聚一堂，交流两类完全不同的经验。日本和德国是两个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实力雄厚，但经济增长属于传统方式，选择的可能性不多；而中国和印度作为新兴经济大国，具有惊人的增长速度以及各种潜在的增长方式。

尽管这四个国家有很多不同之处，但正如弗朗兹·肖泽尔博士在文中提到的那样，它们的经济都面临全球化以及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压力，而这往往是市场化改革的目标。例如，发达工业化国家不得不重新评估其社会制度；而发展中国家不得不寻找稳固的新型社会制度的方案。社会保障和消除贫困是经济良好增长的重要先决条件，组建劳动力市场、贸易市场和资本市场也具有同样的重要性。

因此，我们面临诸多挑战，有些性质相同，有些则起源于不同的原因，这些都需要给予充分的响应。

另一方面，正如德国阿登纳基金会主席福格尔教授去年在印度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指出的那样，全球化进程也提供了大量的机会，促进全球范围的富裕、公正和团结。



为此，我们需要树立一种观念，就是积极促进全球化的正面效应，努力消除全球化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这一理念包括增强各国适应性的一些措施，以及统一世界各国普遍遵守的准则。

我们也注意到，全球化及其对经济秩序的影响将给东亚新型区域化提供绝佳机会，这在“东盟+3”的合作中已经有所体现。这一合作过程不但具有经济意义，而且具有政治和社会意义。而这一过程才刚刚开始，我们对其未来的发展拭目以待。

基于以上原因，此次深圳研讨会所讨论的观点和经验的国际性交流弥足珍贵。我非常高兴的是，本书的出版能够让更多的专家了解本次研讨会的成果。在此，衷心感谢综合开发研究院副理事长李罗力教授的热情支持，同时，也感谢来自德国、中国、印度和日本的专家们撰写的优秀论文。

容敏德

德国阿登纳基金会驻华首席代表

2006年2月

第一章

国际性区域 竞争的经济结果

国际竞争力的经济成就

弗朗兹·肖泽尔博士

阿登纳基金会董事会成员，原德国联邦工商协会总干事

我很高兴也很荣幸在此与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一道，和来自中国、印度、日本和德国的代表参加这次国际研讨会。

此次研讨会的主题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对于欧洲和德国而言，亚洲的三个大国并不仅仅是各种生意的合作伙伴。它们的经济政策和战略也开始日益影响到世界市场。因此我认为这是一种需要，也是一个机会，让我们可以了解如何一起克服经济秩序及国际竞争力等世界难题。几天前我从报纸上读到，182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当年世界的1/3，而印度为1/5。从这些数据可以了解到这两个国家在当时的重要地位。

首先，我想探讨一下经济理论的根源。首位欧洲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18世纪末撰写了著作《国富论》。他解释了国际货物贸易的根本基础是建立在劳动分工的原则之上。但他又补充说：“由于这是一种交换的力量，因此劳动分工必须总是受到这种力量的限制，也就是受到市场范围的限制。”

现今在全球公开市场中这种限制已经不复存在，但劳动分工在世界上仍然是国际贸易的根本基础。市场的开放性决定了全球竞争的强度和效率，我们不能忘记这些基本原理。

全世界范围内正在激烈辩论全球竞争所产生的社会和政治后果。在过去15年里，“全球化”在政治和经济辩论中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如今已经成为主导讨论的热门词汇了。对全球化及其后果应当怎样评判，这仍然是一个意见分歧的话题。有的人认为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也有人认为这是人类克服需求和困苦的历史机遇。还有人认为它恰恰是今天全球不公正秩序的象征。但是，所谓全球化进程的核心何在？

全球化这种现象其实与贸易一样古老。它意味着劳动力和资本这两种要素跨国境流动的提高，同时在国际不断融合的过程中，从经济的角度看，国家间的距离正在拉近。

可以说在上个世纪后十年内，全球化进程的影响产生了巨大的增长。这种发展背后的驱动力主要是，某些国家经济的商品与金融市场放松管制、自由化、并向国际竞争者开放了门户，同时关税与非关税壁垒也逐步消除。

另外的促进因素来自前经济互助委员会（COMECON）国家，它们自1998年以后

对全球经济打开了大门，从而也极大地扩大了参与商品、服务、资本与劳动力国际交换的国家数量。许多发展中与新兴国家也是如此，它们经历了孤立与进口替代的（有时痛苦的）经验，因此也开放了它们的国家经济。

然而如今公众广泛关注全球化的进程，还有其他重要原因，包括：

1. 新的全球物流系统的出现，过去几十年在货物及乘客运输方面发生了巨大的技术进步；
2. 信息与通讯技术的发展更加令人瞩目，如今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提供多种的服务；
3. 发达工业化国家与所谓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的极大差别，包括其各自经济、生产及成本结构的发展水平，其中特别是劳动力成本的差别。

所有这一切的后果就是现有结构面临巨大的变更压力，包括工业化国家以及所谓新兴和发展中国家。企业、农民或工人感受到这种压力，而政府也不例外。这也是为什么对于全球化及其评价的辩论并不是围绕全球化的进程本身，而是围绕着这个进程的后果以及对每个国家的人民和经济所带来的后果，主要是对于政府和议会而言。

任何结构性变革都会带来创造增加价值的机会，这是一个普遍法则。如果这种变革会导致市场上供应者数量增加，就更是如此了；而这也是加强国际经济联系的自然效果。货物与服务的供应增加，质量提高，而价格下跌。但是如果市场正常运作，所有合作伙伴的机会也会增加。

全球化的后果

如果各个国家的企业和人民都能够针对自己具有相对优势的成本结构，并相应地集中生产供应有关货物和服务，而对于那些自己成本结构不具备优势的货物和服务，则在自由交换体系中向外国供应者采购。如果这样，世界的普遍福祉将得到有益的提升，在这一点上不存在原则性的争议。但是，任何结构性变革都会造就赢家，也会产生输家，这一点也同样不容争议。这就是相对成本理论的核心，同样是全球性的问题。

当前，全球化进程的速度与范围对所有参与的国家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要求它们改变自己的经济结构，而这将导致社会与政治的后果，在这一点上也没有异议。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为遭受结构性改变冲击的输家提供缓冲，并让他们对未来有尊严的生活寄予希望，这不仅仅是出于最高的道义要求。对于各个国家的决策者以及从全球化中获益的人而言，他们还是出于一个十分自私的理由，一个国家的经济与政治稳定绝不能被破坏，因为他们利用全球化而获得的利益也取决于这种稳定。但是问题是到底谁是输家，谁是赢家。

目前有一种广泛的观点，认为工业化国家是全球化过程的主要受害者，而多数发展中国家属于输家。我并不能认同这种看法。

世界银行的数字清楚地勾画出另外一种事实。在 20 世纪 90 年代，没有参与国际化进程的发展中国家的实际人均收入增长 1.4%；工业化国家增长 2.2%，而那些参与

了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家则增长 5%。

1971 年至 1999 年间，发展中国家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得到大幅提高，从 19% 增加至 29%。而且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制成品在同期也有显著增长，初级产品的出口比例则同时降低。

最初，全球化过程几乎完全朝着符合工业化国家的利益进行。随着发展中国家与新兴国家开放了市场以及购买力的逐步增强，工业化国家可以大幅增加高级货品与服务的出口，同时进口廉价初级产品的机会也得到扩大，因此财富迅速增加。这些国家具有大量技术工人、运行良好的行政与法律体系以及成熟的基础建设，这些方面的优势大大超过了多数行业成本高昂的缺点。

然而，当贸易合作进一步加强，而投资资本日益流向新兴和发展中国家时，这些市场就出现了竞争对手。他们比工业化国家的生产商和供应商能够取得更高的成本效益。一开始他们的产出几乎完全限于质量较低的产品，主要在工业化国家的利基市场中寻求发展，而新兴和发展中国家的普通质量的产品和服务也开始占领工业化国家的大量市场份额。

作为结果，在欧洲和德国就损失了大量的工作职位，这是因为公司倒闭或者将生产及服务设施搬到了低成本的地方去。我们正在经历一个痛苦的调整过程，包括企业界，也包括公共预算及社会保障体系。目前还看不到这个过程的尽头。

通过欧盟主席巴罗索的一个提议，人们就可以看到这些问题在欧洲的严重性。他建议成立一个所谓的“全球化基金”。这个基金应该为遭受全球市场竞争打击的国家、行业或地区提供补贴。他提到了轻工业，特别是农业。幸运的是，大部分政府首脑，例如德国政府以及新增东欧成员国均对这种新干预工具投下了反对票。

当发展中国家及新兴国家对工业化国家的产品与服务开放市场之后，某些传统生产，例如皮革生产肯定会消失，从而导致工作职位的减少。但是与此同时，对发展中国家私营资本投入大幅增加，特别在 90 年代。现在直接投资已经成为最重要的类别，甚至超过了公共开发援助。相关的技术转移也为许多国家创造了数百万的工作职位。

在许多新兴与发展中国家中，可以观察到全球化发展失控的现象，而且全球化会带来 3 个其他风险：

第一个风险，在很多情况中，家庭与社会无法适应现代化的速度与结构性变更的要求。随着创造收入传统手段的消失，生存就越越来越取决于流动性，就是迁移至有新工作机会的地方。在这个过程中，传统的生活方式以及价值观就失去了，同时家庭与邻居结构所提供的安全机制也不复存在。其后果带来严重的不安全感以及在过程中的不知所措。这一代人与其父母已经没有了共同语言，他们的父母仍然生活在传统的关系网络当中，但移民一代的子女却已经出现伦理缺失的迹象。许多儿童没有受到父母的适当照顾，父母也没有帮助他们周围的世界建立起正确的认识。这种生活中培育了犯罪和暴力的种子，因而散布政治救赎教条的或者宗教原教旨主义分子就很容易在年轻人当中网罗跟随者。在德国来自土耳其的移民，而在法国主要是来自北非的。

第二个风险在于原本很有竞争能力的所有本地行业，由于没有对全球化作出适当的准备，而在全球化进程的突然发展下措手不及，继而被淹没和被淘汰。这样，这些

国家里的人民与企业本来可以从全球化中获益，但是却被剥夺了任何利用全球化机遇的机会。

第三个风险，就是一个国家的社会安定和政治稳定将受到全球化进程中输家的不满情绪、或者偶尔暴力反抗的威胁。对于国家的稳定来说，人民必须拥有通过民主选举而宣泄情绪的渠道。这样他们才不会感到采取暴力行动是惟一能够让他们的利益获得重视的方法。

请允许我简单地谈谈全球化进程中，工业化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所处的不同权力地位。实际上，许多反对者对全球自由贸易和全球化进程的指控都是关系到这些权力和地位的。发展中国家在与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谈判迫切需要的发展贷款，以及向美国与欧洲市场出售产品的配额时，国际社会以及其合作伙伴都会表示这些贷款的提供必须附带条件，它们必须废除其他行业的关税与非关税壁垒。以印度的奶业为例，应该说由于得到欧洲的支持，印度奶业在过去几十年打下了非常成功的发展基础，现在为数以万计的家庭提供生计。欧洲的牛奶在世界市场上的价格较低，印度限制欧洲牛奶的进口以保护本国奶业。随着印度逐步融入世界贸易体系，该国的工业产量不断增加，这就带来了一个重要的政治与经济问题，出现了要求取消限制牛奶和奶产品进口的呼声。有人指出，欧洲复杂的直接与间接补贴体系，扶持了欧洲农民以及欧盟的奶产品行业。但马上就会有其他人指出这些补贴是为了补偿某部分欧洲人口，他们在过去几十年的快速结构调整中受到特别严重的冲击，此外欧盟为了压倒一切的政治原因，也必须保护欧盟的农业。

除此之外，例如糖或粮食等例子也显示出，美国、欧盟、日本以及其他西方工业化国家的确在利用它们的经济与政治力量，来确保在全球化过程中采用双重标准。虽然大型的新兴和发展中国家，例如中国、印度或巴西具有不断扩大的政治与经济实力，因而也许有能力维护自己的利益。但较小、较穷的发展中国家却无能为力。这所带来消极后果的影响往往超过了这些国家通过发展合作及金融援助从工业化国家获得的协助。然而，所有这一切并非出于全球化过程本身，而是出于该过程的发展形式。在某些国家超强影响力下，全球化产生了不公正、不完善以及被扭曲。

我只是间接谈到了国际化的其中一个后果，就是各个国家在一定法律及政治框架下面管理其经济，而国家政府对这种框架设计的影响力正在弱化。随着企业与商业活动日益整合到地区与国际市场中，国家政府对本国经济的影响手段不断减弱，因而逐步丧失了它们的主权。国家税收体系的竞争压力不断增加，社会状况以及社会与环境标准面临压力，而更重要的是：国家政府也日益受限于国际规则与协议，它们的影响力因而也受到限制。在欧盟内部，我们就十分适应这种过程，因为基本上所有经济政策的领域均通过一定程序加以统一。

虽然一个国家的统治实体具有自己的民主合法性，并通过民主选举对其人民保持问责性。但是，在国际范围内仍然没有从制度上建立起具有问责性的民主合法性。这种富于争议的情况自然就会引发对全球秩序政策的要求，以及要求建立根本价值观从而为全球秩序政策打下根基。如果我们无法满足这种要求，我们也就等于抛弃了一些普遍法则。而全世界人民与企业的经济成功正是取决于这些法则。

自 1945 年纳粹政权从政治上和经济上完全倒台之后，德国不得不做出一些非常清醒的决定。这些决定也就是统领重建我们经济与社会体系的根本规则。当时，我们选择了一个我们称为“社会市场经济”的体制。在多数其他欧洲国家经济与社会体制当中，多多少少都可以看到这个体制根基中的同样价值观。当我们各个不同的国家经济体在欧盟内共同发展时，这些内在的价值观就为这个过程定下了方向，在新的欧洲宪法草案中一些重要章节都可以看到它们的身影。

联邦德国成立之后，德国第一位经济部长路德维格·埃哈德教授对沃尔特·尤肯教授的所谓 ordoliberal 流派进行了研究，并据此建立起社会市场经济。马勒·阿马科教授曾经是路德维格·埃哈德教授的秘书，他也是我的博士生导师。他在 1972 年的一份评论中写道：“社会市场经济建立在一种理念上，就是我们生活的大众社会不能离开竞争的力量，也不能离开市场的控制影响力。”只有在一个市场体制当中，个人才可以不受外界限制地管理自己的经济事务，这样他们才能融入整个社会有秩序的经济活动当中，最终对个人与社会均有好处。只有在这样的体制当中，才能够鼓励并奖励个人的创造性和建设性活动，从而提高整个国家经济的生产力，以致最终使这个经济达到一定高度，可以有足够资本为所有人提供符合人道的生活。因此，虽然市场本身并非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但它却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工具。最终的目标是为每个人提供符合人道的生活，这也是市场所要实现的使命。然而，仅仅靠一个强势政府来保障其市场机制与竞争公平性和生产力不受权力影响的扭曲，这是不够的。市场并不能够就此独立运作，也不会自动地朝着为所有社会成员提供符合人道生活的目标发展。除了保障市场机制以外，政府当局的责任之一就是要保证国家中的社会保障的再分配。

我坚信“社会市场经济”政策的基本关键理念可以为我们指出方向，帮助我们努力建立一套全球政策来统领全球化的过程。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国际经济政策，旨在创造出外部条件，让每个人都可以开发自己的发展机会并享受符合人道的生活。这种全球经济的框架包含以下核心要素：更加全面地强化并保护国际市场的自由，在经济过程中保障一定的最低标准，包括社会标准以及保护自然环境的标准，同时为社会中的弱势成员提供最低水平的社会保障。

在我看来，从这个根本立场中演化出的全球化过程，其未来的形式具有几个实际的需求，我认为当中有 6 个需求特别重要。

1. 从历史经验中可以知道，不受干扰的全球化绝对不会自然地形成。假如我们不能负责任地、有创意地去应对全球化的影响，可以认为它将有可能会被完全摒弃。有鉴于全球化过程所带来的黄金机会，特别是对于较为落后的国家而言，我们所做的一切不应该妨碍他们的发展，反而应该予以鼓励和促进。通过有智慧、负责任地加以控制，使其为人类的福祉服务；

2. 在工业化国家中，我们必须尝试帮助人们认识到这个过程，以及它所要求做出的调整都是具有意义的。如果重视保护主义的做法，或者巩固工业化国家目前仍然实行的保护主义政策从而遏制全球化过程的话，这些国家或许可以在中短期内稳定其获得的繁荣水平。但是长远而言，这将不可避免地引发与新兴及发展中国家不断壮大的力量之间的灾难性冲突。无论如何，它实际上都会破坏国际间的努力，而无法在最低

伦理标准上达成一致意见。不加掩饰的利己主义不仅仅会摧毁价值观的可信度（人权、民主、社会正义），同时也将直接影响到我们自己的长远利益。不可否认，工业化国家的人民由于全球竞争而不得不经历的调整可能会导致整体繁荣水平的某些下降。但是总体来说，这也是有限度的。包括增加工作时数、更加灵活的工作时间、对其经济活动的成败负起更大责任与风险以及满足一生学习及增加流动性的要求等；

3. 所谓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不应该由于腐败、政府的缺陷、未发展法治或者拒绝人民参与的机会，而浪费全球化过程所带来的机会。同时，富裕的工业化国家以及国际组织也有责任协助这些国家制定出相应的策略。根据各自的发展水平，找到将其国民经济温和地融入世界经济的方法。另一方面，发展的合作也必须满足未来挑战的需要，包括要建立良好治理及法治、在转型期引导各个国家的框架条件及结构的发展，以便让潜在的成本优势能够固化为国际经济结构；

4. 无论工业化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均不应通过消极防御措施或单单采取补贴的方法来应对这些负面的影响。我们所做的一切均应当为受影响的人民及企业提供各种资格认证计划等形式的生产性替代选择，同时促进更大的灵活性及多元化。同样，较贫穷的发展中国家，特别迫切地需要工业化国家及国际组织的协助。但即使作出了这些努力，相当数量的人口在未来一段时间仍将成为结构性转变过程中的输家。不能任由他们自生自灭，必须通过发展合作来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建议和支持，帮助他们尽快建立起自己的社会保障体系。在这些国家当中，政府发展战略以及发展合作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就是要确保生活在贫困当中的这些人口（在有的情况下数量非常庞大）能够确实实地享受到协助与支持所带来的好处，而且如果实在无法享受到这些协助的好处时，他们也能获得足够的支持，至少让他们的条件不致进一步恶化，并给予他们开创自己生意的机会。例如微型贷款制度等新工具应该可以为此提供帮助；

5. 在一个提高人民福祉的全球化过程中，绝不应让比较富裕的工业化国家自从19世纪中期开始演化出来的所有社会与环境标准受到冲击与破坏，这将是荒谬的；另一方面，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这些标准逐一引入发展中及新兴国家也是不可行的。因此，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然必须确保在一定共识的范围内，随着发展中国家逐步整合到全球贸易当中，要避免或废除至少是大规模侵犯或危害人类正义的行为。包括对自然环境的任何破坏与污染。必须启动一个过程，让发展中国家逐步地接近工业化国家的标准。这将导致工业化国家的紧张压力，这是由于社会与环境标准成为国际竞争当中的成本因素，而导致工作职位的流失；同时在发展中国家也是如此。这是由于人们对提高工作条件、改善环境保护以及更高社会标准的合理要求将使就业及收入的发展放缓。决策者必须谨慎地承担并努力缓和这些压力，并让受影响的人民参与其中；

6. 必须尽快放弃国家与国家市场融入世界市场时的双重标准。除非西方工业化国家希望违背、甚至危害全球化进程，它们将必须提出具体的时间表，显示将在何时、以何种方式重新配置对受到负面影响的企业与人民提供的支持，以便让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产品与服务不再处于不利地位，或者这些产品与服务在进入工业化国家市场时不再受到阻碍。

世界上很可能没有任何国家能够独力执行一套全球秩序政策来确保持续进行中的

全球化过程能够得到负责任地实施。世界上所有大国与联盟均需要为此目标而合作。中国、印度和日本应该在建立全球经济政策当中扮演先锋作用。为此目标，德国人希望提议建立战略性合作伙伴关系。无论德国联邦政府或是欧洲联盟均明确表达了同样的意愿。在我看来，这种合作伙伴关系将建立在广泛共识的基础之上。

要让这种欧亚合作伙伴关系焕发出生命力，德国阿登纳基金会希望提供其良好的服务。德国阿登纳基金会启动了“全球秩序政策”的新项目。在初期阶段之后，我们希望在该项目中与世界新型大国建立起合作伙伴关系。因为今后与项目有关的多数概念开发以及活动均会在这些国家开展。我相信这次论坛将成为这种欧亚联盟的第一步。

结束之前，我想再次提到亚当·斯密。在18世纪末他就关注到亚洲以及亚洲国家的发展。他写道：不论古埃及人、古印度人或者古中国人均没有鼓励对外贸易，而他们均通过内陆航运（也就是从它们的本国市场）就创造出无比的富庶，这实在是惊人的成就。

当这已经成为了历史，我们看到世界发生了巨变。我们也必须为各个国家的福祉而实现全球化的机遇，而在本次会议中我们也将展开世界的对话。

评论

朱文晖博士 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评论员

弗朗兹·肖泽尔博士在国际宏观层面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化过程中遇到的机遇和挑战提出了非常好的架构，同时也谈到了发展中国家的选择和欧盟所受到的冲击。我非常感兴趣的是，他谈到了德国在社会市场经济当中所起的主导作用，特别是德国政府在环保和社会框架当中所起到的作用。我想就他谈到的框架，结合中国的情况做一些评论。

中国的改革开放始于1980年，其间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经历过几次重大的转型，这种转型在时间上又与世界的全球化趋势有多个巧合。例如1978年到1980年中国确定改革开放的路线，刚好是1980年美国 and 英国开始进行改革；1991年冷战结束，柏林墙的拆除和苏联的解体，邓小平在这个时候选择了“南巡”，去拥抱全球化；1998年，东亚遭遇金融危机，在全球质疑这种开放道路是否可持续的时候，中国在1999年做出了一个重大的让步，结束了10多年的入世谈判，在1999年底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并于2001年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之一。

这是中国政府所制定的政策，至今中国政府已经作出了四次重大政策调整，从过去单方面注重全球化，到现在提出“和谐社会”的架构和科学的发展观。中国政府在过去20多年所做的事情，其主要方向是顺应市场力量，也就是顺应了市场的全球化趋势，使商品流通和跨国界的服务更加顺畅。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了资本和劳动力要素正在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然而，在谈到中国政府的时候，我们不要忽视还有地方政府。上述提及的是中央政府的决策，而除了中央政府要提供转轨需求的刺激之外，还需要地方政府来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当然，这需要有一个过程，去招商引资。

在过去 20 多年中，中国可以说是全球自由贸易最大的受益者之一。从统计数据来看，截止到 2004 年，中国是全世界排名第三贸易大国，而且根据我个人的预测，在未来 3 年左右，中国可能会超过德国成为世界排名第二进口大国，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排名第二出口大国，当然可能在总量上还超越不了德国。中国目前是美国的第三大贸易国，很快就是第二大贸易国，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

但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更多是全球化提供的机遇，正如弗朗兹·肖泽尔博士所说的，全球化在提供很大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空前的挑战。目前中国有大部分人脱离了贫困，但是中国的贫富差距也在不断加大。所以我非常认同弗朗兹·肖泽尔博士反复强调的，如何认识全球化的社会和政治后果以及如何来应对。目前在中国反复出现的一个词汇就是所谓的“拉丁美洲化”，中国的沿海地区是否有可能出现“拉丁美洲化”，这个词的反复出现也表明中国在正视这个问题。

现在，人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中国新一代的领导人具有某些与原来不太一样的想法。例如，他们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以及建立“和谐社会”的发展方向。在弗朗兹·肖泽尔博士的演讲当中，我注意到他也反复提到了“和谐”这一词语，说明德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强调“和谐”的。以前中国强调“先富光荣”，现在提出“共同富裕”，我认为这是中国在尝试寻求一种平衡。而这种平衡也不会自动产生，有时候也会出现矫枉过正的情况。所以我认为，未来中国在寻找平衡的过程当中，一方面要尽快地把握全球化带来的益处；另一方面要提高消除全球化带来负面影响的能力。德国在过去 50 多年的经济成长过程中，尤其在环保和劳工保障方面所积累的经验都是非常值得中国借鉴的。

本章讨论

文尼特·弗曼尼：实际上，德国实行的也是出口带动或者是贸易带动的策略，我的问题是，这种特别大的国家，比如中国，如果它继续实施出口导向型的策略，就算在全球化过程当中，到了某一点中国也会成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国，它能够往下走多远呢？

朱文辉：中国的出口肯定是会持续增长的。当然按照我的预测，在大约 3 年的时间内，中国还会保持一个比较高的出口增长速度。这个“高”是相对的，比如说它高于世界平均增长水平的 10%。1999 年到 2004 年这个时期大概高出 15%~20%，所以未来 3 年左右中国还会高 10%。如果这个预测成立的话，意味着中国很可能在未来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大出口国。但是我预计 5 年以后中国的出口增长速度会逐渐放

